

反训即反义同词吗？

李万福

近来谈反训的文章称反训即反义同词。“反训”是训诂学术语，训诂学与文字学、音韵学构成传统的小学。“反义同词”是基于现代语言学的新提法。既然小学不同于语言学、训诂学不同于语义学，术语对科学体系的依存性告诉我们，反训也很难与反义同词完全一致。

从符号学角度看，任何等级的指号，只要兼指相反的东西，都不利于信息传递。例如自然指号——雪，如果冬天夏天都会下雪，我们就无法凭它判断季节。低级人工指号——十字路口的红灯，如果既指示前进又指示停止，撞车事故必然更多。高级人工指号——语词，例如“落”有落成、坠落实义，《离骚》：“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句中“落英”到底指初开的花还是凋谢坠落的花，几百年不能定案。可见，同时具有两个相反的意义是一切指号的缺陷。

萨丕尔说：“只有五种语言在传布文化上有过压倒势力。它们是古典汉语、梵语、阿拉伯语、希腊语和拉丁语。”①古代汉语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语言之一，它的确有“不可悉数”②的反训。然而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。研究表明，只有由词义引申产生的反训中有很少一部分够反义同词的条件。因此，反训多不是反义同词多。区别反训与反义同词不仅有利于维护古代汉语的威信，也有利于放开眼界，全面探讨反训成因，把反训研究引向深入。

(一)

语言随人类历史而发展，特殊的词义现象往往是历史的镜子，古代汉语大量的反训，折射出古代中国历史悠久、土地辽阔的特点。普通语言学告诉我们：语言随时间推移，转化为古今语；在空间展开，分化为方言。历史悠久，汉语的古今差异必然很大；土地辽阔，必然有众多方言。

词汇是语言最活跃的要素，词义变化是词汇活跃性的重要表现，时间越长，词义变化越大。以丰富著称的汉语词汇经历四千多年（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），其间有少数词的意义变得与原义对立乃是十分自然的。例如“走”，现在指行走，古时指奔跑；“去”现在意为“到……地方去”，古时意为“离开……地方”。“走”、“去”两词意义向对立面的转化是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完成的，因而很显眼。可是，有些词早在古代就完成了意义转化。如：

禽：篆文“禽”。“今”是声符，“内”象兽足蹂地，“凶”象兽头。从形体看它的古义指野兽。所以《说文解字》说：“禽，兽之总名。”但在先秦典籍中“禽”已普遍用来指鸟，只在用于泛称时指鸟兽。

围：本义指防守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围，守也。”《公羊传·庄公十年》：“围不言战。”何休注：“以兵守城曰围。”这个词的本义在先秦已很少使用，而引申义指包围却被广泛使用。据此《正字通》说：“围，环绕而攻城也。”

粪：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弃除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古谓除秽曰粪，今人直谓秽曰粪。此古义今义之别也。”

构成“走”、“去”、“禽”、“围”、“粪”等词对立意义的双方，除转化的过渡时期外并不同时使用，不致引起交际混乱。正如“老爷”一词在解放前为尊称、解放后为贬称，我们不能说“老爷”同时具有褒义贬义一样；也不能把这样的反训称为反义同词。

古代汉民族使用的语言实际上是各地的方言。当时所谓“凡语”、“通语”不过是一些跨方言区使用的词。在此情况下：一方面通语、凡语处在不同方言中，意义演变情况很难一致，可能导致反训；另一方面各方言有自己特有的词，某些方言词可能发展成为凡语、通语。不同地区的人用同一语音形式指不同的事物，甚至相对立的事物，本是不足为怪的。由于汉字可以同音通假，有些没有书写形式的方言词也借音同的字为书写符号；结果那些来自不同方言的意义相反的词，往往被看成一个词而称为反训。如：

介：《列子·杨朱》：“无介然之虑。”《经典释文》：“介，细也。”《易·晋·六二》：“受兹介福于其王母。”虞翻注：“介，大地。”钱绎说这是“以相反为义”③。其实训大的“介”是“𡗗”的借字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𡗗，大也。”段玉裁注：“经传多借介为之。”《方言·卷一》：“𡗗，大也。东齐海岱之间曰𡗗。”可见“𡗗”是方言词，只是它与凡语“介”音同才被判为反训。其实两词的意义是不相干的。所以扬雄明确指出现象“𡗗”这样的词是“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。”④

济：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济，成也。”《方言·卷一》：“济，忧也。……陈楚曰泾，或曰济。”陈楚方言以“济”为忧，凡语以“济”为成，本是互不相干的。由于陈楚方言词借用了凡语的书写形体，有人却说“济，忧其不济也，古人语每有相反者”⑤，硬把两词捏为一个词。这种牵强的手法被王念孙斥为“曲为之说而终不可通”。⑥

“介”、“济”两字相反意义的双方本是两个方言词的意义，它们用于不同的空间。由于相反也是一种密切联系，加上音同和书写形体混用，才被看成一个词的两个意义。这种现象称为反训，适表明一些训诂家缺乏历史观点。我们称它为反义同词就更不对了。

总之，由于古代汉语不是一时一地的语言，而辞书、字典兼收并蓄每个字在各个时期、各个地域的意义，又不标明各项意义使用的时空范围，我们自然会在其间发现大量的反训。事实上“古今语言时俗不同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”⑦，有许多反训的意义双方如同张飞岳飞位不到一块儿。

(二)

训诂学的“词”是指虚词，并没有现代语言学概念的“词”。训诂家以字为中心，围绕形、音、义进行解释。因而训诂术语“反训”是指对字义的反相训释。古汉语有几词共一形

体的现象，字义就不等于词义，字义的相反训释不一定是词义的相反训释。例如“廋”有隐藏义，借为“搜”，训搜寻。“济”有援助义，借为“挤”，训消灭。乾嘉学者已用求本字的办法把这种现象排除在反训之外。即使如此，字与词也还没有完全统一。还须除去以同音假借为桥梁联系在一起“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”。这样，字义的解释便是词义的解释了。那么，对词的任何训释都算词义吗？我们看哪些情况下会造成对词义的相反训释。

（一）训诂家见解相反要造成反训。如：

耸：《左传·昭公十年》：“悔之以忠，耸之以行。”杜预注：“耸，惧也。”意为惩罚。“耸”与“懨”同音假借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引《左传》：“悔之以忠，懨之以行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懨，奖也。”意为鼓励。

施施：《诗·王丘》：“将其来施施。”毛传：“施施，艰难进之意。”郑玄笺：“施施，舒行伺闲独来见己貌。”“艰难进”与“舒行”对立。

岵、屺：《诗·陟岵》：“陟彼岵兮”、“陟彼屺兮”。毛传：“岵，山无草木也”、“山有草木曰屺”。《尔雅·释山》：“多草木岵。”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屺，山无草木也。”两书的训释与毛传相反。

（二）望文生训会造成反训。如：

匹：《楚辞·思怀》：“怀质抱情，独无匹兮。”王逸注：“匹，双也。”“匹”也用作量词。古汉语表数量有一个特点，如果量词前的数词是“一”，便可以省略。如“一杯酒”说“杯酒”。《公羊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：“匹马只轮无反者。”何休注：“匹马，一马也。”“匹”本是“一匹”的省称，却被训为“一”，与“双”相对。《辞源》据此给“匹”立一义项为“单独”，与“双”的对立就更明显了。

走：《仪礼·士相见礼》：“某将见走。”郑玄注：“走犹往也。”《吕览·荡兵》：“民之呼号而走之。”高诱注：“走，归也。”本来“走”在前句中指见面急切，后句中指归顺急切，都与本义“疾趋”有关。注疏者为了使文义更明，据语境的需要作了适当调整，并不意味“走”有往、归两个对立的意义。

（三）别名释共名会造成反训。

《荀子·正名》：“万物虽众，有时而欲徧举之，故谓之‘物’。‘物’也者，大共名也。……有时而欲徧（当作徧）举之，故谓之‘鸟’、‘兽’，‘鸟’、‘兽’也者，大别名也。”徧举时鸟兽有别，徧举时都可以称为物，这正说明了别名与共名的相通关系。由于共名与别名之间存在相通关系，古人著书用共名，后人用别名去训释，那么，共名在不同语境中就可能得到相反的训释。如：

化：《礼记·乐记》：“和，故百物皆化。”郑玄注：“化犹生也。”《淮南子·精神》：“故形有摩而神未尝化者。”高诱注：“化犹死也。”两处注释都是用别名训共名。《周礼·大宗伯》：“以礼乐合天地之化。”郑玄注：“能生非类曰化。”《集韵》说得更详：“天地阴阳运行，自有而无、自无而有，万物生息则为化。”可见“化”是共名，“生”、“死”是低一级的别名。

“臭”的情况更复杂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春臭羶”、“夏臭焦”、“中央臭香”、“秋臭腥”、“冬臭朽”，文中把各种气味都称为臭，因为如王筠所言：“臭为腥臊羶香之总名。”⑥“臭”既为总名，就可用别名训释。如：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皆佩容臭。”孔颖

达疏：“臭谓芬芳。”后来“臭”专指恶味。泛指一切气味是古义，“谓芬芳”是古义的“训释义”。“训释义”与后起义相反，也称为反训。

上述由于训诂家见解相忤造成的反训，其中总有一方是错误的，当然不能与另一方构成反义同词。望文生训和别名释共名产生的反训，连注疏家也不一定认为它们便是词的意义。所以往往用“犹……也”、“之言……也”、“谓……也”等术语训释。意思是说某词在句中可以这样理解，并不意味词义就是这样。正如段玉裁所说：“凡言‘之言’者，皆转其义之词。”⑨又说：“凡汉人作注云‘犹’者，皆义隔而通之。”⑩连词义都算不上，也就谈不上反义同词了。

(三)

如果被反义词训释的词叫反训，同时也承认所训的意义就是词义。那么反训必然是反义同词吗？

以“苦训快”、“息训劳”、“乱训治”、“适训归”为例，为形象地表述反训与反义同词的区别，据《辞源》列出各对反训的有关义项，制表如下：

苦	快
①痛苦	①快乐
②急	②迅速
息	劳
①休息	①用力辛勤
②慰劳	②慰劳（音力报反）
适	归
①往	①返回
②归	
乱	治
①动荡不定	①清明安定
②治理	②管理
③造反	

（图中↔表示同义关系，→←表示反义关系）

从上表可以看出，每个被训释的词都有一个义项与用来训释的词意义相同，又有一个义项与用来训释的词意义相反。这是必然的，因为没有相同则不可相互训释，没有相反便不得称反训。由此推断：甲词有这样两个义项，其中一个与乙词的意义相同，另一个则相反；那么，用乙词训释甲词便叫反训。但甲词却不一定具有两个互为相反的意义。如“苦训快”：

《方言·卷二》：“遑、苦、了，快也。”郭璞注：“苦而为快者……训义之反复用之是也。”“苦”与“快”的确是反义词，所以历代学者都把“苦训快”视为反训的典型。我们透过词义平面，深入义项考察。“快”有快意、明快、快急⑨等义项。这里说“苦”有“快”的所有义项还是其中一个呢？典籍中找不到“苦”用为快意、明快两义的证据。《庄

子·天道》：“斫轮疾则苦而不快。”《淮南子·道应》也有此句。高诱注：“苦，急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苦，急也。”王念孙疏证：“快与急亦同义，今俗语犹谓急为快矣。”所以钱绎在“逞、苦、了，快也”下说：“此条有三义。‘逞’为快意之快，‘苦’为快急之快，‘了’为明快之快。”②取“快”的“快急”义去解释“苦”的“快急”义，这不正是同训么。只是因为“苦”有“痛苦”义、“快”有“快乐”义，才被称为反训。然而，“苦”有痛苦、快急两义却构不成反义同词。

何种反训是反义同词，有规律可循。以上四例，“苦”、“息”不是反义同词。图中可看到它们与反义词的关系是：表示相反关系的线与表示相同关系的线平行。“乱”、“适”是反义同词。它们与反义词的关系是：表相反关系的线与表相同关系的线相交。由此推断：被训释之词的两个义项分别相同和相反于用来训释之词的同义项，被训释之词就是反义同词。

“乱训治”最能说明反训与反义同词的区别。“乱”与“治”之间有两对意义相反的词项，假设没有“乱③”，它们间还剩一对意义相反的词项，因而仍够反训的条件。但这时，表示意义相同的线就不与表意义相反的线相交。就是说如果“乱”没有“造反”义，“乱训治”仍是反训，但“乱”就不是反义同词了。④

比较以上关于反训和反义同词的推断可以看出，反训与反义同词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，并非所有的反训都是反义同词。

此外还须提到两点：一、从来没有一位训诂家就意义相反下定义，现代语言学却有颇严密的定义。现在看来“罪”训“治罪”、“乱”训“治乱”、“蠹”（蛀虫）训“暴书中蠹虫”、“污”训“去其污”、“莱”（乱草丛生）训“除草”、“槁”（木枯）训“润其枯槁”、“粪”（除秽）训“污秽”都不是真正的意义相反。

二、索绪尔把词音形式与词义内容的紧密联系喻为一张纸的两面，沙夫把这种独特联系称为“透义性”，并认为它是语词指号区别于其它任何指号的本质特征。正因为具有透义性，词才能成为思想的直接现实⑤。笔者认为透义性也是词汇意义与词义活用的分野。用它衡量反训，会发现许多都算不上词义。“反义同词”应体现语言学有关意义相反和词义的科学定义。如果严格遵照现代语言学的定义，并除去一个词的两个相反意义不在同一时期、地区使用的现象，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：反义同词是屈指可数的。

综上所述，反训与反义同词在外延与内涵方面都很难重合，还是把它们区别开好。

注 释：

①见萨丕尔《语言论·语言研究导论》。

②王念孙《广雅疏证·卷二》：“凡一字两训而反覆旁通者，若乱之为治、故之为今、扰之为安、臭之为香不可悉数。”

③钱绎《方言笺疏·卷一》。

④扬雄《方言·卷一》。

⑤钱绎《方言笺疏》、王念孙《方言疏证补》均说：“卢云：‘济者，忧其不济也。古人语每有相反者’。”

⑥王念孙《方言疏证补》。

⑦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音辞》。

⑧王筠《说文释例·卷十八》。

（下转第70页）

(一) 批判旧学带有妥协性。廖平当时的政治思想，处于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改良派过渡的中间环节，而倾向于要求改良的民族资产阶级。由于刚从地主阶级中产生出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，它与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所以廖平在批判封建旧学，提出变法改制主张时，具有严重的妥协一面。他批判汉学和宋学，然而却美化孔子，把孔子尊为“素王”，称为“生知”。他说：“孔子受命制作，为生知，为素王。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。”（《知圣篇》）廖平把孔子说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，孔子的思想是超越时代，“百世可以推行”（同上）的。他利用封建圣人孔子的招牌来宣传变法改制，以文质之说来表达向西方学习的要求，这种古为今用的手法虽有某些进步和可取之处，然而一定的思想理论是一定时代的产物，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什么超越时代，通行百世的理论。廖平的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方法固然可以减轻“非圣无法”的压力，同时也反映了改良主义思想理论的薄弱。

(二) 缺乏具体的政治改革主张。从廖平的思想体系来看，他是主张变法改良，挽救危亡的。但是廖平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对今文经学的理论研究上，比较地遵守今文家法，虽然他也考虑到借助孔子变法救弊，学习西方，然而他不象康有为那样，把学术思

想与政治实践密切结合起来，从事积极的政治活动，提出一系列具体的变法措施。可以说，廖平主要是今文经学的理论家，而康有为则是把今文学习的理论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政治活动家。这也是为什么康有为的学术思想“其渊颇出自井研（廖平）”（梁启超：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，而他的社会影响却大大超过廖平的原因。

(三) 保留封建的纲常伦理。廖平虽然对封建主义的弊端作了批判，也主张改文从质，学习西方。但他又认为，“中外各自有长短，弃取是为交易。”（《改文从质说》）中国和西方各有各的长处，也各有各的短处，应该互相弃取。中国的长处在于“形上之道”，西方的长处是“形下之器”。所谓“形上之道”，即封建的伦理纲常。廖平认为，封建的纲常伦理是应该保留而不能去掉的。他说：“三纲之说非明备以后不能兴，既兴以后则不能灭。”（《知圣篇》）这表明廖平的思想，即使在比较进步的时期，也不能和封建顽固派完全划清界限。

由于这一时期廖平的政治思想存在着以上局限，所以在戊戌政变后，政治风云的变化使得廖平的政治思想由进步逐渐转向落后以至反动，最后和康有为一样，提倡尊孔读经，鼓吹倒退，成为历史车轮的拦路石。

（上接第63页）

⑨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·网部·罢》。

⑩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·言部·讎》。

⑪“快”的“快急”义起得很晚。但晋以后文人作品中已广泛使用。据此推测，《方言》成书之时至少“快急”义已在口中使用。

⑫钱绎《方言笺疏·卷三》。

⑬有人认为“乱”的“动荡不安”、“治理”两义也相反。就是说，即使“乱”没有“造反”义，仍然是反义同词。果真这样，他也得承认“动荡不安”与“管理”相反。就是说“治②”与“乱①”相反，又与“乱③”相同；关系线又相交，恰好与本文的推断相符。

⑭参波兰语义学家沙夫所著《语义学引论·语词指号的特性》。